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甜.《沙漠随想》:布林克的“双向文化使者”隐喻——以文学人类学为视角[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13-19.

# 《沙漠随想》:布林克的“双向文化使者”隐喻

## ——以文学人类学为视角

张甜

(武汉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南非作家布林克的长篇小说《沙漠随想》具有文学人类学的典范意义,小说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选择,隐喻了布林克幼时在暴力环境下的暴力成长、离开南非的自我觉醒以及回归南非的“叙事治疗”,最后主人公成长为坚守南非的“双向文化使者”。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小说呈现了南非阿非利卡人在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下的文化境遇,从作家的虚构世界中,呈现出作家心灵成长的自我投射,为南非 20 世纪的历史、阿非利卡民族和非洲本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人类学材料,表达了开放包容、沟通理解的人类学价值观。

**关键词:**沙漠随想;文学人类学;南非;双向文化使者

**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6-0013-07

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是 20 世纪后期随着人类学与文学的不断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跨学科,它关注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转向,或称人文转向;二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又称文化转向。<sup>[1]</sup>后者的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状况。文学人类学这个概念最初由费尔南多(Fernando Poya-tos)于 1977 年提出。1988 年,他再次对文学人类学做出界定:“文学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它从人类学角度对不同文化的叙事文学进行研究。这些文学蕴含各种关于人类思想行为的历时、共时分析,是这方面最丰富的文献资料来源。”<sup>[2]</sup>文学人类学一方面要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文学,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文学分析发现人类学的素材,并以文学形式丰富人类学的表达方式。在文学人类学的处理下,文学不再

是孤立的字面上的东西,而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中的有机组成部分。<sup>[3](P38)</sup>

南非白人作家安德烈·菲利普斯·布林克(1935~2015)见证了南非 20 世纪的历史大事件,他的人生境遇和选择镜映在小说《沙漠随想》中。这部小说具有文学人类学的典范意义。小说讲述了南非国民大选之际白人女性克里斯汀回到故土南非发生的故事。她从伦敦回到南非,在祖母病床前了解到家族中伟大女性的历史,并由此受到启示,留在南非。小说中克里斯汀的人生经历和选择,镜映了作者布林克的文化选择和心灵成长,是布林克文化境遇的缩影。文学人类学通常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看待、思考和研究文学<sup>[4](P88)</sup>,强调把一切文学现象当作文化现象来看待,挖掘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真实的历史景观。因此,将《沙漠随想》置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加以解读,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有鉴于

收稿日期:2022-07-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非英语小说民俗书写研究”(22BWW065)

作者简介:张甜(1989—),女,湖北武汉人,讲师,主要从事南非英语小说研究。

此,本文以文学人类学为视角,结合布林克回忆录《岔路口》、布林克访谈录和南非历史记录,尝试探索小说《沙漠随想》的人类学意义,即对于作家而言,布林克的白人文化身份与南非阿非利卡作家之间的文化选择与自我对话,从中揭示出人类交流的文化密码。

## 一、文化暴力的环境生成与暴力成长

南非作为人类学的一个殖民文化场域,是武装暴力和意识暴力相交织的历史产物。自 165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在好望角建立殖民据点开普敦<sup>[5]</sup>,南非开始了长达 300 年的种族主义政治。荷兰后裔被称为阿非利卡人,与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在相互对抗和合作中联合统治南非,他们以法律的形式分别在 1910 年和 1948 年推行和强化了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种族压迫和剥削体制。<sup>[5]</sup>长期以来,这颗毒瘤不仅残害黑人和有色人种,也在荼毒南非白人。在种族主义和白人霸权主义阴霾下,不同种族之间彼此隔离,黑与白之间相互对立,互为寇讎。

1935 年,布林克出生于南非自由州省弗雷德市,父亲是治安法官,母亲是教师,父母都酷爱莎士比亚戏剧和狄更斯小说,这让布林克从小浸润在经典文学中,为他后来的文学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阅读外,还有一件事也一直影响着他,那就是他所成长的“暴力环境”。布林克的回忆录《岔路口》的第一章是“暴力的小镇”。幼时的他被灌输黑人和有色人种的邪恶,听古老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前称)故事:黑人会藏在白人小孩的床脚,晚上爬出来吃掉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牛车尾部。现实生活中,他却经常因为黑人被殴打发出的惨叫而难以入眠。种族主义话语的规训构成了布林克幼时主要的焦虑。

这种暴力不仅体现在白人对待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剥削和奴役上,也体现在阿非利卡社区的暴力环境中。年幼时,父亲治安法官的工作让布林克很早就接触到了一些南非真实的社会事实。他常偷偷地溜进法庭,坐到法庭的后排,听父亲审理各种案件。<sup>[6](P17)</sup>“这使我感到相当自豪。上帝在天堂,父亲在审判台上,正义必将获胜。”<sup>[6](P18)</sup>坐在法庭审判台上的父亲化身为“正义之师”,布林克对他充满敬畏,几乎每一次,父亲都可以敏锐地在纷繁冗杂的材料中找到证据,惩恶扬善。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父亲在布林克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一个被主人殴打致重伤的黑人向父亲求助,但父亲表示无能为力,让他去找警察。受伤黑人说他找过了,警察把他打得更厉害,所以他才来找治安法官的。父亲继续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而年幼的布林克却什么都做不了。<sup>[6](P18~19)</sup>布林克在《沙漠随想》中改写了“这一铭刻于文化记忆中的成长细节”:克里斯汀帮助了一位向她求助的受伤黑人,将其藏匿在家中地窖里,躲避白人纠察队的搜查,并给他食物和药,帮他渡过难关。<sup>[7](P41)</sup>这是布林克对幼年时父亲拒绝帮助受伤黑人的一种想象性的补偿,但是“作用并不大,这件事一直在影响我,我仍然能看到他流血的脸”<sup>[6](P20)</sup>。世界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父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人类学现场的活生生的事实,让布林克从虚构的文学中一次次回到“暴力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是人类学试图验证的一个历史结局,每个当事人都无力回避,却又无法忘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少年布林克是南非原初的“心”——企盼和平的“古老灵魂”,而求助者和父亲,则是南非暴力人类场景的承受者,本质上,求助者与父亲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他们都是这一人类学场域的见证人和实施者。少年布林克的这份南非原初的“心”,可以用来理解《沙漠随想》的创作之“心”。

南非社会成为暴力的渊薮,并如迷雾渗透到孩子的成长中。布林克在回忆录《岔路口》中有这样的记录:小时候布林克组织更小的孩子做自己的学生,为的是体验老师抽打学生的快感;他将捕获的鸟儿一只只用气枪打死,然后大哭一场。笔者结合回忆录的内容,将其解读为幼年时外在环境的暴力和内心的善的激烈冲突。这本书的封面,是少年布林克骑着一只跳羚的照片。这是他猎杀的第一只跳羚,他将跳羚的尸体摆出奇怪的姿势,用大腿夹住,抬起它的头,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活的。这张照片揭示了他童年世界的很多东西。乍一看,是孩子的纯真。多棒啊! 13 岁,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猎物。而这一幕其实潜藏着一个非常真实和血腥的真相,那就是,一个孩子为了让自己在成年人的世界,特别是成年男性世界中得到接受而去杀死美丽的生灵。<sup>[8]</sup>这张照片不仅仅是布林克的一种自我揭露,也是对他所成长的“暴力环境”的一种讽刺。

这种普遍存在的暴力也被布林克多次写进了文学作品中。《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家族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南非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书写了克里斯汀家族女性的故事。她们多数处

于这个不断走向纷乱的国家的社会底层，身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困境之中，却镜映了最真实的南非历史现实。家族历史中，克里斯汀的曾祖母蕾切尔、高祖母彼得罗内拉，还有更加遥远的女祖威廉敏娜和卡玛，她们都具备匪夷所思的超能力，却因为是女性而被边缘化。在南非的男性上帝的世界里，只有儿子才算数<sup>[7](P91)</sup>，而女孩只有嫁人才有进入社会的身份。此外，克里斯汀家里的老女仆的孩子们也常遭到白人警察的无端虐待，更遑论基本权利了。<sup>[7](P44)</sup> 细致梳理小说情节，可以发现克里斯汀小时候因为是女孩，不得父母重视，甚至险些在姐姐安娜的婚礼当天遭到姐夫的侵犯。姐姐婚后长期处在丈夫暴力压制下。姐夫品行败坏，花天酒地，甚至对妻妹打起歪主意。安娜除了要承担起独自照顾五个孩子的重任，还要像仆人一样伺候丈夫，并忍受丈夫对她的贬斥和家暴，她俨然已是沙文式夫妻关系的牺牲品。除此之外，在南非纷乱的政治环境下，她还要时时刻刻提防家里遭到暴力武装分子的入侵，所以她给孩子们都准备了黑色睡衣，以便在危急时刻逃跑和隐蔽。<sup>[7](P56)</sup>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将所有人裹挟在痛苦和灾难的大漩涡中，不仅给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种带来了无尽伤害，也给白人的生活 and 生命体验蒙上了巨大阴影。布林克的青少年经历和他笔下人物在南非的成长，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种族主义无时无刻不在伤害着南非这片土地。

## 二、文化救赎与远离南非的自我觉醒

现实为布林克的觉醒创造了绝佳的机缘。1959～1961 年，布林克获得资助，前往巴黎索尔邦大学主修比较文学。两年的巴黎生活给布林克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巨大的改变。幼年时在南非，布林克接受的是正统的阿非利卡式的白人教育。1959 年之前，布林克与其他白人中产家庭的孩子并无二致，即使熟知白人迫害黑人的情况，也没有想过是否正当。

来到巴黎后，他身边出现了不少具有良好文化素养，能流利地讲法语和英语的黑人，这让他不仅第一次结交到与自己地位平等的黑人朋友，而且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贬低黑人的言论不过都是公共胡话而已。在 1993 年的一次采访中，布林克谈到：“在南非我接触到的黑人不是劳工就是家里的佣人，我甚至从没想过世间竟然有黑人律师、黑人教师或者黑人学生！在巴黎，我周围突然有了一批黑人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所掌握的文学知识甚至

比我过去七年学到的还要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化上的冲击，而且是一次十分愉快的冲击，它开启了我对新领域的探索之旅。”<sup>[9]</sup> 1960 年 3 月，南非当局在南非东北部城镇沙佩维尔(Sharpeville)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黑人群众，70 多人被无辜杀害。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巨大轰动，也极大地震惊了布林克，他发现他所熟悉的南非实际上是如此的陌生和可怕，与巴黎相比，南非是何等不同的世界！布林克曾这样评价沙佩维尔大屠杀带给他的政治意识的觉醒：“1960 年早春，我出生在巴黎卢森公园的一张长椅上。”<sup>[10]</sup>

让布林克深深迷恋法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阿尔伯特·加缪，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加缪就是他的人生导师。在很长时间之内，布林克对文学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流派的追随者。直到读到加缪，布林克表示，“对我的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伯特·加缪，特别钦佩加缪关于人要对强加给自己的困境进行不断反抗的观点，并对无意义的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反应”<sup>[11]</sup>。“我不只是敬仰加缪，我热爱他”<sup>[6](P132~133)</sup>，热爱他笔下西西弗斯那不知疲倦的坚持，无休无止的反抗，与不公正、与谎言、与压迫斗争到死的精神。“他不仅为我的巴黎之旅、法国之旅提供了地图，更为我的余生提供了蓝图。”<sup>[6](P134)</sup> 于是布林克开始在书写里，用存在主义的笔调，描绘那些不愿与世界上的压迫者同流合污的好人。

回南非的决定让他痛恨自己，他根本不想回去，一想到南非就恨之入骨。<sup>[6](P170)</sup> “经过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和所学，我不能够再写关于南非的任何东西了，如果要写，那肯定也是与以前彻底不同的。”<sup>[6](P305)</sup> 《沙漠随想》可称之为文化自我的发现和文化救赎的实践。在布林克的笔下，克里斯汀青年时代因为无法忍受南非社会暴力的大环境和家庭伦理败坏的小环境而出走英国，定居伦敦，并且努力不让过去的事情影响到自己。<sup>[7](P11)</sup> 在文学人类学的视域下，小说情节不是孤立的字面存在，而是人类文化现实的镜映。年轻的布林克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但是唯一能确定的是，一旦有机会，他一定要再次回到法国，而且要留下来。<sup>[6](P193)</sup> 布林克在回忆录《岔路口》中书写了自己青年时代理性追求的痛苦，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极度失望和对平等、自由和友爱的社会的无限向往。

## 三、文化回归与南非场域的“叙事治疗”

《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重回故乡，重新发现本



土传统的伟大与丰富,隐喻了布林克的文化回归,以及回到南非场域所体验到的“叙事治疗”。文学最初的功能就是“治疗”。叶舒宪曾在《文学与治疗》中强调文学的精神医学功能,重申了人类生存的精神生态状况与文学治疗密切相关。<sup>[12]</sup>文学给读者带来滋养,在此之前的文学书写其实也是一种叙事和倾诉。文学人类学让文学回到其所滋生的文化田野,重新理解文学的“人学”实质。

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大量故事的持有者被称为“故事讲述家”,这类人见多识广,勤于记录,往往具备深厚的生活体察能力、敏锐的细节捕捉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再现能力。民间故事具有集体流传和家族传承的特征。“故事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多数都是在家庭中进行,由长辈传述给子女或晚辈,带着祖承、家传的性质。”<sup>[13](P83)</sup>仔细梳理小说情节,可以发现克里斯汀的祖母就是这样的“故事传承人”,她记得家族中很久远的故事,并且在她曲张有致的语言肌理里,祖辈的女性仿佛活了过来,存在着一种维持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年过期颐的祖母在南非国民大选的动乱中严重烧伤,命悬一线。而她作为家族故事传承人,坚持等到孙女克里斯汀从伦敦归来,因为克里斯汀“不仅仅是她最喜欢的孙辈,也是她挑选出来继承家族的记忆、往事和幻想的人”<sup>[7](P8)</sup>。祖母病危,克里斯汀需要回到南非,对祖母的责任迫使她不得不面对南非。于是在弥留的病床上,祖母带着她开启了家族长河的寻根之旅。作为讲述者,这也是祖母重温生活的最后机会,“而且是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温过去的生活”<sup>[14](P290)</sup>。在文学治疗的神圣空间里,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sup>[4](P249)</sup>

叶舒宪说:“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4](P256)</sup>克里斯汀的祖母在家族故事中告诉她祖辈女性如何在更糟糕的生存环境中活出自己,教会她如何保持对过去的开放心态,如何去期待未来和未知,让她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也就为她向何而去指明了方向。家族的故事摘下克里斯汀防备的面具,获得神力的语言成为治疗的力量源泉,冲洗掉她心境里的尘埃,使长期屈居于故土之外的她呈现在自由的阳光下。小说结尾,克里斯汀留在了南非,参与国民大选,用自己的行动继续书写家族女性的

历史故事。

故事和故事叙事挽救了布林克笔下的人物,同时也为作者自己创造出安全的空间。诗人和作家的创作时常出于自我治疗的需要,布林克也不例外。因为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布林克原本打消了学成回国的念头,但由于经费问题,1961年,布林克不得已回到他所痛恨的南非。他没有立刻将巴黎所感受到的“文化重生”转化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动力,因为他对本族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不安和羞愧。1963年,布林克担任杂志《60年代的作家们》(Sestigers)主编,他借此掀起了“60年代辈”的阿非利卡文学运动,为南非小说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刻意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文为医,将在巴黎所获取的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思想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如同在回忆录里所说的,“故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地方”<sup>[6](P87)</sup>,为他提供了暂时逃离现实负荷的可能性。

#### 四、《沙漠随想》的人类学隐喻:坚守南非的“双向文化使者”

乔伊斯曾说,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在心灵的冶炉之中,铸造出他的民族尚未创造出来的良心。1968年,巴黎爆发“五月风暴”,这场红色抗议不仅让布林克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sup>[15]</sup>,也让他认识到身为作家对于社会的责任,以及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作家所要扮演的具体的社会 and 道德角色。于是布林克从巴黎归来,这一次的回归和1961年不同。这一次,他想要回去,即使南非是条即将沉没的船,也要回去。<sup>[6](P305)</sup>因为这是一个来自布林克内心深处的决定,不是外界强加的。<sup>[6](P306)</sup>布林克决定坚守南非,并进行更有责任的创作,剑指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带来的社会弊病,体现了作家的文化理解和文化实践之间的深度对话。

人类学模式的文学,旨在使我们恢复全部的人性,重视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重访巴黎归来的布林克,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学创作去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因此他的作品几乎立刻与种族隔离政府允许的文艺作品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分野。他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断受到种族隔离政府的骚扰、跟踪、监视和查抄,甚至被推到阿非利卡人的对立面,朋友家人与之反目,成为“部落的叛徒”。然而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让很多同辈作家为之震撼,库切一直称布林克为“十分勇敢、正直的人”<sup>[10]</sup>。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注

视黑暗》，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黑人约瑟夫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和与一位白人女性热烈但注定失败的爱情。这部小说因为触碰了文字审查制度禁忌的话题，成为南非第一部遭到查禁的小说。此后他同时用阿非利卡语和英语进行创作，如果阿非利卡语的作品在南非遭禁，英语版本的书也可以在英语世界赢得读者，南非的故事仍然可以在全世界被人们读到。他也因为在作品中大胆向外界揭露南非当局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获得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的曼尼斯曼尼人权奖。

布林克后期创作非常留心西方文学传统与非洲本土民间文学的融合，这与他的成长，与他对南非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和他对欧洲传统文学的熟稔息息相关。作为阿非利卡白人小孩，布林克由黑人保姆带大。《岔路口》中就有一张他三岁时与黑人保姆艾娅的合影，他说是她让自己认识到语言节奏的魅力。<sup>[6](P136)</sup>布林克在很早的时候就深受非洲本土口头传统的影响，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故事给我的世界带来奇迹，我生命中许多早期讲故事的人都是黑人，有带我长大的保姆，有朋友农场里的黑人男女，我小时候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sup>[16]</sup>。这些故事化作灵感，注入布林克的笔尖。《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家族历代女性中有不少人具有超能力，比如被视为异类遭到父母幽禁，却具有高超艺术禀赋的蕾切尔——祖母的母亲<sup>[7](P89)</sup>；具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和预言能力的彼得罗内拉——祖母的祖母<sup>[7](P100)</sup>；还有更加遥远的祖先卡玛，可与鸟兽虫鱼交流无碍，可随意消失在沙漠之中<sup>[7](P182)</sup>。这些故事无疑增加了文本的景深感，突出了布林克对非洲本土文化的自觉性。

文学人类学认为，故事和神话是一种连接物，它们连起了文化与自然、自我与他人、生者与死者，由此在他们的讲述之中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sup>[4](P246)</sup>《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的祖母会经常去家族墓地，和逝者聊天，吸收祖辈的智慧。布林克也曾表示：“非洲有一种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向世界展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际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17](P26)</sup>活人与死人之间的自如交流则是诸如祖鲁语、科萨语和苏陀语等语言中非洲口头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4 年，南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布林克的人身自由和写作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他不断来往于欧洲和非洲之间，频繁出席文化文学会议和学术活动。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在象征性地跨越边界，并把协

调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文化和知识距离视为他的核心工作<sup>[18]</sup>，成为坚守南非“双向文化使者”。

### 五、布林克小说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二战后的南非社会开始了极为狂热的文化政治，美学严格服从于政治，渗透到有关艺术的公共话语中。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育不全，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敌视。那些敏感的心灵或以笔的力量表达抗议，或从日趋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中逃离。那一代南非作家，白人、黑人或有色人种，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神经触碰到的这一切。

戈迪默的文学作品是种族隔离那个黑暗时代的南非社会的纵断面，小说以“局中人”的视角揭橥南非人与所处环境的密切关系。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和爱的丧失，是库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一直试图摆脱南非监狱般的畸形环境<sup>[19](P9)</sup>，于 2002 年移民澳大利亚，完成了作家主体到书写的从民族向世界的转变。彼特·亚伯拉罕斯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激进的黑人作家的典型代表，作品揭露了南非有色人种的极度不幸，他本人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流放于牙买加，获得精神上的自由。<sup>[19](P20~21)</sup>穆达顺应南非文坛“重新发现平凡”的创作指向，“转向边缘性的民间世界，以民俗文化为表现方式……寄托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sup>[20]</sup>。

作为南非作家、文学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布林克属于南非最早一批积极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和南非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府的知识分子。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激荡下，他代表了南非阿非利卡人在政治境况多变和从外部世界看南非的过程中的文化抉择，同时，植根非洲传统的成长历程和对政治文码的个性化解读，让他的作品在南非文学的洪流中独树一帜。他一生的政治和生命体验丰富多彩，见证了诸多重大事件，包括 1948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1963 年南非民族主义政府文字审查制度的实施，1968 年巴黎“五月风暴”，1994 年南非国民大选<sup>[21](P421)</sup>。历史的语言五彩斑斓，政治境况风云变化，布林克作为阿非利卡民族的知识分子，作为以国际视野看南非的作家，在历史的起伏中艰难地探寻着自己的文化定位。

在 1959 年留学法国之前，布林克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阿非利卡人。大学期间，他甚至加入了阿非

利卡的秘密社团,该社团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sup>[10]</sup>到法国后,他开始以崭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国家,对南非感到憎恶,拒绝回南非。后来因为留学经费问题不得已而回去,成为杂志《60 年代的作家们》的重要成员,促进了南非小说的现代化。他以文学的文化整合和治疗功能建构写作世界,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疗愈。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他坚守南非,作品成为西方文化与非洲本土文化相互争夺主权又相互融合的场域,这也是南非文学的民族性。

布林克一生的创作在时间上大体以 1959 年、1968 年、1994 年为界发生过三次转型,历经四个阶段:对阿非利卡传统文学的探索阶段,对阿非利卡传统文学的反叛阶段,对南非种族隔离现实的批判阶段,对南非历史进行想象性的重构阶段。这三次转型的关键因素是布林克在巴黎的留学和访学经历、南非政治境况的嬗变以及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吸收、运用和发展。

1959 年是布林克创作和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关捩点。在此之前,布林克的生活和创作极具阿非利卡民族的风格传统。拿作家自己的话来说,“那时的我仍然是个十分传统的阿非利卡男孩”<sup>[6](P39)</sup>,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拥趸,坚信南非的男性上帝,对身边黑人的遭遇和生活状况,他并没有问题意识。

1959 年到 1968 年属于布林克的阿非利卡传统文学的反叛阶段,他创作了几部具有欧洲风格的阿非利卡小说,批判阿非利卡宗教和道德观,大胆描写性爱。这些书写属于“60 年代辈”的阿非利卡文学运动,旨在用阿非利卡语创作具有欧洲风格的文学来对抗种族隔离政府支配下的传统阿非利卡文学。<sup>[10]</sup>这次运动“以既微妙又深刻的方式推动了阿非利卡语读者政治想象的改变,为阿非利卡民族以及他们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构想,这种构想明显不同于种族隔离政府的政治与文化领导者试图投射给他们的那个为了自身生存而决心摧毁一切威胁的民族形象”<sup>[22]</sup>。

1968 年巴黎“五月风暴”到 1994 年南非第一次国民大选期间,布林克坚持“在现场写作”,以笔为戎,挥斥方遒,在作品中对违反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扭曲的社会环境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一时期,“抗议文学”是主调。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分化瓦解,布林克的书写开始享受更多的自由,不以区域为界,不以种族为限,不以男女区别,也不以阶层划分。“一是审

视那些在种族隔离期间被忽视和被禁止的历史;二是叩问两种形式的沉默:男性支配下边缘化女性的沉默,白人宏大历史主导下弱势族裔的沉默;三是探索南非殖民主义历史和种族隔离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记忆和身份问题;四是揭示南非社会同黑暗的去和解过程中的动荡与不安。”<sup>[10]</sup>

在探索这些主题的同时,布林克深深根植于非洲口头文学传统,对其进行不同层面的次第展现,不同视角的轮番审视。除《沙漠随想》外,布林克众多小说建构了非洲本土文学空间。《魔鬼山谷》(1998)中,卢卡斯·先知从坟墓中爬出来与魔谷里的生者和谐共存,在非洲本土文化中,逝者从来不曾远去。《沉默的另一面》(2002)中,布林克揭示了叙事的疗愈功能,身受重创的汉娜被非洲土著部落纳马族救起,在他们的救治下奇迹般康复。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草药的疗效,更是因为纳马族部落文化的传统故事。《别样的生活》(2008)主人公可以在不同种族和性别之间不断切换,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体验南非各个阶层的生活。《菲莉达》(2012)中逝去的小弗朗西斯一直跟随着妈妈菲莉达,而菲莉达从斯坦林布什回赞第府列特庄园一路上都有古代亡灵相伴。这些书写镜映了新时期南非“重新发现平凡”的创作宗旨,也体现了布林克作品中地方性再现的人类学价值。

## 六、结语

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和“文化原型”上,还包括动态的、丰富多彩的、正在被创造的,甚至正在发生的文化事象。而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很有活力的文化现象,“因为构成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实际上就是作家对所处文化语境的一种内在反映”<sup>[23]</sup>。文学之苍翠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现实中力求超越,由此揭示出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布林克的文学书写揭示了南非阿非利卡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烙印,也是作家的心灵成长史。如此,我们便有机会对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文本获得领悟,了解真正的南非历史和真实的布林克。2015 年 2 月,布林克逝世于从欧洲飞往南非的荷兰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对于这样一位一生都在象征性地跨越边界的作家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有诗意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挥手道别了。他在暴力纷乱的政治环境和不断走向分裂的历史困境中,秉持着开放包容、沟通理解的人类学价值观,走过了在南非的暴力环境下成长、离开南非到回归南非的历程,最后成为坚守南非的“文化双向使者”。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2]Poyatos F.Literary Anthropology: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eople, Signs and Literature[M].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8.

[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叶舒宪.文学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余建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J].史林,1997(2).

[6]André Brink. A Fork in the Road[M].London: Harvil Secker, 2009.

[7]André Brink. Imaginings of Sand[M].San Diego: Harvest,1996.

[8]Peter F.Alexander. Book Reviews: A Fork in the Road by André Brink[J].Transnational Literature,2009(1).

[9]Bahgat Elnadi, Adel Rifaat, André Brink Talks to Bahgat Elnadi and Adel Rifaat[J].UNESCO Courtier,1993(9).

[10]周小青.“岔路口”的抉择——安德烈·布林克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型[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5).

[11]Isidore Diala. History and the Inscriptions of Torture as Purgatorial Fire in André Brink’s Fiction[J].Studies in the Novel, 2002(1).

[12]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3]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第三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9.

[14](澳)郝思特·孔伯格.故事的力量[M].薛跃文,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15]蔡圣勤,张乔源.论布林克《菲莉达》创作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5).

[16]Felicity Wood. Interview with André Brink (Cape Town, July 1999)[J].English Academy Review: 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01(1).

[17]Derek Attridge, Rosemary Jolly. Writing South Africa: Literature, Apartheid and Democracy[M].Cambridge: Cambridge UP,1998.

[18]Isidore Diala. André Brink: An Aesthetics of Response[J].Tydskrif vir Letterkunde,2005(1).

[19](南非)康维尔,克劳普,麦克肯基.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1945—)[M].蔡圣勤,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20]胡忠青.扎克斯·穆达小说民俗书写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1.

[21]郑家馨.南非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22]J. Brooks Spector. André Brink: On the Fall of the Giant[DB/OL]. <http://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5-02-09-andre-brink-on-the-fall-of-a-giant/>.

[23]刘大伟.文学人类学视野中《柴达木文事》[J].青海社会科学,2019(2).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

*Imaginings of Sand* :Brink’s Metaphor of “Bidirectional Cultural Ambassador”  
——A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Zhang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College, Wuhan 430205, Hubei)

**Abstract:** *Imaginings of Sand* by South African writer André Brink is an exemplary piec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e upbringing and life choices of the novel’s protagonist are metaphors for Brink’s violent upbringing in a violent environment as a child, his awakening after leaving South Africa, his “narrative therapy” back to it, and finally a steadfast South African “bidirectional cultural ambassad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e novel presents the cultural situation of Afrikaners in South Africa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ircumstances, and his fictional world shows the projection of the writer’s spiritual growth, thus providing vibrant anthropolog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20<sup>th</sup> century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Afrikaner nation and indigenous African culture, and expressing the anthropological values of openness, toleranc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Keywords:** *Imaginings of S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South Africa; bidirectional cultural ambassador